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

何立波

政协记忆 zhengxiejiyi

杨匏安在广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广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杨匏安

走上马克思主义传播之路

杨匏安，字麟焘，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北山村的一个破落茶商家庭。1911年，杨匏安赴日求学。留日期间，杨匏安经常跑图书馆与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形成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6年，杨匏安奉母命离日回乡结婚。婚后不久，杨匏安离家到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杨匏安举家迁往广州，在广州时敏中学和道根中学任教，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的记者。

《广东中华新报》是广州当时一家规模较大、影响较著的报纸，报道过一系列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在北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广东中华新报》从1919年6月起创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以介绍科学知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

在广州期间，杨匏安发表了数十篇文言体的散文、小说、翻译和旧体诗。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言小说《王呆子》，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为父姐复仇诛锄恶霸的故事。这种以农民反封建为题材的小说，是当时文坛少见的作品。

杨匏安对社会变革时代的黑暗表示愤慨，担忧国家前途和未来走向，探索救国救民的良方。杨家祠是杨匏安在广州期间的住所，曾经是广东党、团组织早期的重要活动场所，周恩来、苏兆征、张太荣、谭平山等均为这里的常客，党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个地方商议和酝酿的。在这里，杨匏安从一位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虽不及北京、上海影响力大，但传播的时间却比较早，而杨匏安就是在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

杨匏安在青年时期也曾一度将中国革命的前途寄希望于辛亥革命，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到1919年，杨匏安已经在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对杨匏安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路。

杨匏安这时不再写过去那种《世说新语》式的笔记小品和旧体诗，而开始在报刊上热情地向读者介绍社会科学。在1919年下半年，杨匏安为《广东中华新报》撰写了50余篇近10万字的文章，介绍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为华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从1919年7月12日起，杨匏安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发表了41篇共2万多字的文章，分别介绍了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观点，其中属于社会主义学说方面的论文有9篇。

在杨匏安的《世界学说》系列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分19天连载完成，与李大钊11月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发表。杨匏安热情地赞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高度的评价，还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论，指出资本家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近代社会阶级冲突的根源。

1984年，著名学者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介绍了杨匏安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迹，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充分肯定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修订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书时，将杨匏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迹写入了新版第一卷里。

杨匏安还结合中国国情，研究西方的农村地租问题，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一书，并节译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的部分章节，印成小册子出版，对当时各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起到了参考作用。

入党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春夏，杨匏安加入了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继谭平山等数人之后广东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当时，杨匏安转入南武中学任教，后来又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兼任教员。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杨匏安积极从事著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2月，杨匏安为青年团广东支部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创刊号撰写《宣言》，公开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

这篇《宣言》已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合乎我国国情的革命策略思想。他提出了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杨匏安成为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在《青年周刊》第4至第7期，杨匏安再次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为青年团的改组，以及帮助华南青年清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掌握革命真理，起了重要作用。杨匏安认为，要实现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建立广大同盟，首先应注重“农民运动”。他认为工农联盟非常重要，在强调工农联盟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国内各阶层的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要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学生、妇女、青年等团结起来，共同革命。杨匏安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政权尚握在军阀官僚手里，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权。为增大革命势力起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应联合作战。”杨匏安的这些思想，为后来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都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匏安为中央组织部秘书。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匏安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九名常委之一。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杨匏安当选中央委员。1929年，杨匏安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7月，杨匏安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1931年8月，杨匏安英勇就义，时年35岁。杨匏安牺牲后，周恩来悲恸异常，称之为“革命领袖”。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

“西湖会议”的几个“关键”细节

李传玺

100年前的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执委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讨论以什么方式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最近，浙江省委宣传部、统战部和党史研究院联合长三角各省市有关部门召开“西湖会议”研讨会。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就西湖会议召开的各方面问题和重大历史价值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探讨。但笔者认为，还有几个“关键”细节被忽略了，这些细节可能对会议的成果有着重要意义。

李大钊态度的“由来”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关于“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遭到了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人的强烈反对，之前赞同了马林提议的陈独秀此时再度犹疑，甚至站到了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此建议、落实共产国际的要求，李大钊站了出来。通过他的威信和细致解释，最后通过了提议。

李大钊何以能把这一提议阐释得如此透彻？1922年3月底，马林前往北京，将他通过考察和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袖沟通交谈所得出的国共合作的思考，通过苏俄使馆汇报给共产国际，在此期间，没有资料表明马林和李大钊会面，但有可能会较早得知了马林的思考；8月12日，马林陪同越飞回到北京。

越飞前来，就是奉苏俄政府之命，担任特使和孙中山联络，促成国共合作。这期间，李大钊和越飞曾经会面。8月17日下午8点，越飞在王府井大街二条胡同“私宅”，“招待我国新闻界”，并发表演说，指出“欧战之结果使法孤而美强，强国不免再起战端，弱国应联合免受欺凌”。18日晚，李大钊以北京学界名义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越飞。胡适记有日记：“夜七时，守常请俄国代表约佛(Yoffe)吃饭，同来的有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者Ivanoff(爱兰挪夫)及参赞二人。陪客的有孑民、孟和、石曾、梦麟。孑丈有演说，我也演说了几句，约佛作答。”这个聚会直到深夜12点才结束。

与越飞的会面表明，李大钊南下出席西湖会议之前，应该早就领会了马林的提议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以他的信仰和性格，他应该坚定维护。所以他能够在西湖会议上双方争执不下时，站出来力排众议，帮助马林实现共产国际的旨意。

当时的会风

民主集中制一直到中共五大时才作为组织原则写入党章。那么，西湖会议时的会风是如何的呢？

马林于4月下旬前往苏俄汇报工作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五、六月份接续推动国共合作的达林(受青年共产国际委派前来帮助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述下了当时中共领导人开会的情景：每个人发言都不受时间限制，出现不同意见时，中国同志则遵循全体一致的原则。因此只要某一方面没有改变看法，或者没有找到大家一致同意的新决议时，就不做什么决定。“说服”会持续好几天，而完全没有采用表决和多数票的方法解决问题。

回顾当时的这一会风，可以看出，李大钊在会议期间所做的说服工作，并仅仅用一天多时间便使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的难能可贵。

张国焘的两面派做法

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上被推为负责组织工作。据当事人后来回忆，张国焘非常善于弄权，正是这样导致后来很多参与创党的同志脱党。在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期间，张国焘应该是耍弄了两面派做法。

张国焘作为中共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1月召开的东方民族大会。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就是如何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推动东方各国共产党如何与各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建立联合战线。会议期间，列宁还会见了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人。列宁曾征求二人意见，问他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与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回答说可以。

张国焘3月份回国后，应该积极贯彻推进会议精神和列宁意见的落实。但没想到，无论是马林4月初与中共领导人的沟通协商、达林主持的有关讨论会上，还是在西湖会议上，张国焘都极力反对，成为国共合作动议阶段的最大绊脚石。

马林的“被监控”

共产国际二大后，马林即被委派前来中国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但他动身前来中国的整个过程，即被监控，每一环节都被所经各国迅速用电报的形式向驻在北京的使馆和在上海的租界作了通报。他一到上海身后就有了“尾巴”。马林身材很胖，这一形象使得他无法化装，很容易识别跟踪。这就是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有人闯入，并随即受到搜查，而他一见有人闯入，即觉不妙，随即中止会议，并建议会议异地进行的原因。

这样一个人，此番从苏俄再度来到中国，不可能不受到监视。如在上海再度召开会议，无法保证安全，这也是会议定在相对不显眼的杭州西湖召开的原因之一。

陈独秀的“被捕”

中共二大后，随着形势的严峻，中共其他领导人曾劝说陈独秀离开上海。这时，马林建议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中央前往广州开展工作，陈独秀不愿。结果8月9日上午，陈独秀正在位于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的寓所中伏案写稿，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德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等，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

经过各方营救，迫于各方面的强大压力，8月18日下午，上海法领事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交保释放。马林陪同越飞来中国，12日到北京，他急于落实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想法，没有停留，而是立即南下。那时从北京到上海一般需要4天时间，按此算，马林回到上海应该在16日或者17日。陈独秀正要释放。

一个被监控人物，一个待罪或可疑人物，如何可能再在上海召开中央全会？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借鉴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经验，决定移师西湖召开会议。

◆◆◆◆◆◆◆◆◆◆◆◆◆◆

综上所述，西湖会议是在马林和陈独秀都是被作为重点盯防人物前提下，无法在上海召开只好移往他地召开的中央全会。张国焘不仅没有认真贯彻东方民族大会精神和列宁的要求，反而以极“左”的面目极力阻挠国共合作，并且影响了陈独秀的态度。鉴于当时没有民主集中制，必须取得一致方能通过决议的情况下，面对两种不同态度的对立，李大钊较早领会马林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精神，极力说服，得以保证西湖会议圆满结束，从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顺利建立，帮助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走上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央。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统战部)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李大钊的善心

姚秦川

1916年，李大钊从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国内，后经过好友章士钊的举荐，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一职。两年后，李大钊被评为教授，月工资增长至200元。当时，李大钊还在其他学校兼职，每月收入接近3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李大钊牺牲后，中外记者纷纷来到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租住的府右街朝阳里3号家中采访。当看到李家贫穷的景象后，记者们一个个惊讶不已：李大钊作为大学里的知名教授，家中为何如此寒酸？他的工资到底用在哪里去了？

原来，共产党小组成立时，因缺少经费，李大钊每月捐出薪俸80元，用于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在已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资助革命最多的人。后来，在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时，也是李大钊资助并筹措解决经费困难。1919年，工读互助团成立时，在《新青年》上刊登募集经费的启事，李大钊得知后，第一时间“捐现洋10元”。一年后，李大钊为家乡筹办女子学校，“川资二十元，由我捐出”。

当时，许多人都知道李大钊乐善好施，所以，遇到困难便常去找他。李大钊只要手头有钱，往往来者不拒。如果手头恰好没钱，他会写个借条，让他人到北大会计室领取，发工资时，再让会计把上月借的钱扣除。许多人心疼他的做法，担心长期下去，他们家的生活受到影响。李大钊则平静地说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尽自己的一些微薄之力。自己的生活且过得去，大家不必太过挂念。”

每月发薪水时，李大钊领到的常常是一大堆借条，拿不到几个现钱。校长蔡元培听说后，特意嘱咐会计：“李先生的薪水扣下一部分，交由李夫人，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从中可见李大钊因为经常帮助他人，全家人的生活确实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瞿秋白的“提案”

周二中

瞿秋白也写过“提案”，这是怎么回事呢？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当时瞿秋白与毛泽东等一起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员。

瞿秋白早在1918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后，又以记者身份赴莫斯科，在苏俄采访学习了近两年，广泛了解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方方面面。瞿秋白认为，列宁走的路，俄国走的路，就是中国今后的路。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瞿秋白立即写了多篇纪念文章，一方面当然是表达对这位革命导师的怀念，更重要的是宣传列宁的革命思想。瞿秋白认为，与其他众多社会主义思想家相比，列宁的特点“第一便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

瞿秋白经过深思熟虑，感觉中国要走俄国道路，必须将列宁的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于是，当年4月5日，瞿秋白给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和谭平山写了封信，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相当于一件重要的“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建议国民党组织力量编译《列宁文集》。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只有国民党才有财力来做这件事。“提案”中，瞿秋白自告奋勇地表示自己可以承担“总校订之责任”，相当于总纂了，真要做起来，这个担子是不轻的。

廖仲恺时为国民党左派，而谭平山则是中共党员，瞿秋白向他们二人提议，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向国民党中央反映此事。

“提案”很快报到孙中山那里，4月14日，孙中山就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第21次会议，讨论了这件事，会上说成是要编《列宁全集》。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同时发扬民主，让大家研究这个问题。然而，当时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戴季陶提出不同意见，说要先编译《苏俄法制全集》，《列宁全集》的事暂时缓一缓。

瞿秋白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提案”可能实现不了。他在当年5月6日给鲍罗廷写信说，国民党右派似乎在有组织地活动，他们正在进行有针对性地煽动，不仅是反对我们，而且是反对国民党左派。瞿秋白的预感是对的，他的那件“提案”最后以各种理由被国民党右派否决了。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鲁迅不忘师恩

张 雨

鲁迅在诸多老师中，最敬重的一位，就是他的启蒙老师——寿镜吾。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写道：“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鲁迅对寿镜吾先生的敬重。

鲁迅小时候，父亲得了重病，需要一味3年以上的陈仓米做药引，家人四处寻找，均无功而返。就在无可奈何之际，恰巧，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家里有，便拿着送了过来。虽然有了药引，但鲁迅父亲的病最终也没有能治好。尽管如此，鲁迅对寿镜吾很是感激，虽然他已离家外出求学，但只要有机会回到家乡，他就一定会去看望寿镜吾先生。

据《鲁迅年谱》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初一，此时鲁迅已经由南京矿路学堂放假归家，去三味书屋向寿镜吾贺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秋之间，鲁迅奉母命回绍兴与朱安女士完婚，鲁迅在家仅停留了四天即重返东京。但他还是抽出一天的时间去探望了自己的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

有一年，寿镜吾生病，鲁迅听说一种西药对这种病有疗效，本就生活拮据的他，四处筹集资金，把这种药买到带给先生。寿镜吾感动地说：“当初的一点陈仓米，我家恰好有，只是顺手帮忙，况且最终也没能起到作用，你不必挂在心上！”鲁迅却说：“我父亲病危，您时刻记挂，还送来我们急需的药引，您的恩情，我怎能忘记！”

1902年至1909年，在东渡日本留学的8年间，鲁迅经常写信向寿镜吾先生汇报学习情况和对老师的问候与祝福。每次写给恩师的信都其情真真，其意切切，足见他尊师重道的高贵品格。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方志敏在狱中写作

王 剑

1935年1月，方志敏率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数日，弹尽粮绝被俘，被关押在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他在生命的最后7个月，利用敌人给他写悔过书的笔墨纸张，在狱中写下16篇文稿，总计10余万字，其中就有名篇《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在就义前几天，把文稿托付给胡逸民、高家骏等人。经专家考证，这些文稿分4批向狱外传递，先被辗转交给了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胡又将文稿转交给宋庆龄。后来，宋庆龄将文稿转交给冯雪峰，冯雪峰又遵潘汉年的嘱咐，将文稿交由谢澹如保存于上海。1953年，中央办公厅将《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拨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收藏。

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时，他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中国的呼喊”。文章最精彩的地方，是方志敏的美好展望：“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可爱的中国》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告白，也是对奋斗人生的热情宣言和殷切期待。令人欣慰的是，历经80多年的勠力奋斗，今天，方志敏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方志敏牺牲时年仅36岁，正值青春年华。看过他照片的人，相信都会留下深刻印象：站姿挺拔，眼神沉静坚定地直视前方，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这是一个因为心怀信仰而无所畏惧的人，虽身陷囹圄，依然器宇轩昂。